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Japan

doi:10.6752/JCS.201206_(14).0009

文化研究, (14),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2012

作者/Author：藍弘岳(Hung-Yueh Lan)

頁數/Page：273-31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Japan**

Hung-Yueh Lan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
「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

藍弘岳

本文最先發表於在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台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5月）。在此感謝當時的評論人張其賢教授所提出的意見。另外，劉紀蕙教授、蔡孟翰教授亦在不同場合給予拙文修正的意見。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亦給與中肯且具啟發性的意見。這些意見皆使本人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再者，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曾獲日本交流協會招聘至日本短期研究一個月，在此特別致謝。又，本文是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東亞現代性的知識構成與民族國家」及國科會100-2410-H-009-030-號計畫的成果之一。

藍弘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hungyueh7@gmail.com

摘要

本文將從「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從18、19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的「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主要以釐清日本之「海國」想像知識系譜，以及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連為論文目的。因為日本從自覺其為「海國」開始，逐漸不再以「島國」之姿模仿彼岸「陸國」之政治與軍事等的制度，而是改以渡海而來的西方國家為典範，向其周邊的海洋、大陸與島嶼擴張。就此意義而言，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與亞洲大陸的「陸國」差異化，其脫亞意識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當日本企圖以「海國」之姿展開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有亞洲的近鄰諸邦而已，是以「海國」的想像、建構與欲成為「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的亞洲論述纏繞在一起。也就是說，「海國」想像與「脫亞」思想、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等三種思想複雜地交錯在一起。本文欲從思想史的角度，釐清此一交錯的思想狀況。藉此，希望能對亞洲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一思考方向。又，此一複雜的思想狀況當從江戶思想史的內部來探究起的，故本文將檢討林子平、本多利明等江戶後期思想家的言論，然後探討福澤諭吉等明治思想家與亞洲主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諸種「海國」想像與其亞洲論述。而且，亦將討論東邦協會所譯介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與近代日本之亞洲論述的關連。

關鍵詞：日本、西洋、海國、海權、亞洲論述

Abstract

When European maritime powers occupied most of sea spaces, they began to trade with Asian countries, and gradually to colonization of large areas of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the meantime, the border was invented in the Asia, and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started to argued about the border of Japan, to recognize Japan'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s a maritime nation (海國). And they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as a way to make differences from China. So In the 18th century,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o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no longer imitat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s of continental nations (陸國, notably China); rather, they took the Western maritime powers as a model to build the nation and expand territories. In this sense, to imagine Japan itself as a maritime nation was a step, or maybe a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attempt to de-Asianize (Escape from Asia, 脫亞), also, it was a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ism (especially of those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 That is to say, the cultural border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as invented by the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same time, they break the border of the Asian nations to become the west. So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Japan's imagination of being a maritime na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sianism's emergence in modern Japan. For this purpose, I will examine the discourse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oncerned with building up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from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n I will discuss Alfred Thayer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serv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mphasis on military overseas expansion in Japan's (expansionist) Asiaism. At last, as China is urging to get the sea power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nt to rebuild China as a maritime nation recently. I will discuss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maritime nations in the border of seas.

Keywords: Japan, the West, maritime nation, sea power, discourse of Asia

一、前言

近年來，中國在成爲經濟大國後，積極地展開海洋戰略、發展海軍，欲往海洋發展(McVadon 2009: 374-400)。這亦觸動自認爲是「海國」（海洋國家）日本的神經，認爲中國的海洋戰略威脅其在海洋的生存空間（山田吉彥 2005：39-50），使得海底資源、海洋主權等問題常成東亞各國輿論焦點。此一現狀亦促使吾人不禁去思考日本是何時開始有「海國」意識的？

如上，釐清日本之「海國」想像知識系譜是本文目的之一。本文另一目的是，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又有何關連？說到亞洲主義或亞洲論述，相信很多人會想到竹內好(1910-1977)。他對亞洲主義有一個有意思且有名的說法：即他認爲亞洲主義是無法客觀限定的思想，欲對亞洲主義做歷史敘述大概是「中了歷史主義之毒的偏見」（竹內好 1966：262）。誠然，「亞洲」是歐洲人命名的概念，又不若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不具實體性內容，需依附於種種思想。然「亞洲」之所以成爲問題是因爲該概念在近代日本歷史語境中被稱爲一種「主義」（如後述之「亞細亞門羅主義」等），一種意謂合理化日本在亞洲之擴張的意識形態，一種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理念。此意義的亞洲主義當是在19世紀末，在英美主導的國際政治情勢中逐漸構築而成的。即所謂的亞洲主義是，在19世紀的英國與20世紀的美國主導之國際體系中，抵抗英美之主導而欲建立區域霸權之次體系理念、意識形態（平石直昭 1998：176-177）¹。但在作爲歷史概念的亞洲主義（「亞細亞門羅主義」等）興起前與後，皆有許多相關思想傾向與論述（概括稱之亞洲論述）存在。所謂的亞洲主義與其前後的亞洲論述皆具思想史相關性。爲分析起見，本文將這些多元且複雜的亞洲論述先分爲「脫亞」論述與「興

1 亞洲主義英文通常翻爲Pan-Asianism，當注意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Pan-movement的關係(Saaler 2002: 8-10)。

亞」論述²，然後將「興亞」論述再下分為：I.結盟主義型³、II.擴張主義型⁴、III.理想主義型⁵、IV.浪漫主義型⁶等四種來理解，而主要以「海國」想像為主軸來探討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間之思想關連⁷。

當歐洲國家開始向外擴張、殖民，來到他們命名為「亞洲」(Asia)的空間內部，進行貿易與土地占取之時，亞洲內部為海守護的日本亦開始面向海洋，認識到其身為開放的「海國」特質與優勢。明治時期政論家陸羯南曾在一篇社論中說「島國」與「海國」是「兩語一義」的，但相對於「島國」是「非難之辭」，「海國」則是「獎勵之辭」⁸。明顯地所謂「島國」的意象是封閉、內向的，「海國」所具的意象則是開放、外向的。

-
- 2 但此兩種思想傾向並非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滲透的（米谷匡史 2006：6-13），故本文並非將兩者作為二元對立的概念理解。
 - 3 所謂結盟主義型亞洲論述主要指將近代世界理解為戰國狀態，立基於日本國家利益與現實主義世界秩序觀，欲抵抗西洋而以合縱連橫之外交手段展開的日清提攜論等亞洲論述（藍弘岳 2011：100-101）。
 - 4 所謂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主要指立基於日本國家利益與現實主義世界秩序觀，欲在經濟乃至軍事層面上將其勢力擴張到亞洲其他地區的論述（後述）。
 - 5 所謂理想主義型亞洲論述主要指立基於普世的人道主義、王道理念、民權思想、馬克思主義等，欲連帶或解放亞洲的論述（如宮崎滔天等人之論）。
 - 6 所謂浪漫主義型亞洲論述是指從藝術或美學觀點，立基於浪漫主義心情、理念等，強調亞洲文明一體性乃至文化連帶性的論述（如同倉天心之論）。
 - 7 有關亞洲主義的研究，汗牛充棟，在此不一一列舉。需特別說明的是，研究者對於亞洲主義一語的理解不盡相同。大抵而言或可分為兩類，一類將之限定為近代日本在國際政治中設定的區域主義理念乃至政策構想或運動。在這類的理解中亦有較廣義的理解，將亞洲主義相關的思考傾向與論述皆包括在內而言之，此類論述常將之上溯至明治初期乃至江戶後期的思想使用，探究其思想源流。例如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基軸、連鎖、投企）中的用法等。本文中使用的結盟主義型與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皆與此意義的亞洲主義有密接思想關連。另一類則是著重於反抗前述區域權理念的亞洲主義相關思想主張，具反霸權、反殖民主義之意義。如孫文與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或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等。本文中所謂的理想主義型亞洲論述與其意義的亞洲主義有密接思想關連。至於浪漫主義型亞洲論述則與上述兩類皆有關連。
 - 8 在他看來，近代日本得以迅速與「先進國」為伍在於具「海國」素養，而得以發達，雄飛為如歐洲的「海國」（特別指英國）（陸羯南 1902：409-410）。

另一方面，「海國」不僅是「島國」之對比概念，亦是與「陸國」差異化的概念。就地理情況而言，大抵海島國家和海岸線明顯長於陸地邊界的半島國家可說是「海國」（海洋國家），內陸國家或海岸線短於陸地邊界的國家則是「陸國」（大陸國家）。關於海洋與陸地這個兩個元素，黑格爾(G.W.F. Hegel)指出，陸地與家族生活原理有象徵的相關性，具安定與停滯的意象，海洋則與商業有象徵的相關性，具流動、冒險的意象(Hegel 2001b: 189-190)⁹。就此理解，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吾人可說相較於「海國」具依賴於海洋而營生之商業的、冒險的開放意象，「陸國」具依賴於大地而營生、思考之農業的、重視家族的（或說儒教的）保守意象。雖然19世紀日本知識人當主要是以地理意義來主張日本是「海國」的，但透過與「山國」等中國觀（後述）的對比，其所謂「海國」亦當含有上述之認識論意義。故在本文中，「海國」這一歷史概念主要是就地理情況與其所具之認識論意義來理解的，「陸國」則是相對於此意義的「海國」，使用來概括大陸國家的概念。所以，「海國」想像意指向海洋開放、擴張之國家想像¹⁰。如後述，那亦是19世紀日本知識人對於跨海而來的西方文明國家的一種認識與想像。

再者，在文明國所主導的世界史中，如史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所說，「世界史是海權國家對陸權國家鬥爭，陸權國家對海權國家鬥爭的歷史」(Schmitt 1971: 12)¹¹。此文中之「陸權國家」（陸權，land power）與「海權國家」（海權，sea power）主要是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來說的。史密特與黑格爾一樣，利用陸地與海洋兩個元素來論述世界史，但他的論述與黑格爾的不同是，並不以航海爲推進世界歷史的主要動因，更重視人類用新元素重組自己生活的能力與啓動空間革命的能力，亦重視工業革命等歷史事件的影響(Connery 2001: 190-193)。從這個角度，他用「陸權」與「海權」這組概念來

9 在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Hegel 2001a: 109) 亦有對海洋與陸地之類似說明。

10 因爲本文主要討論的是18世紀以後的思想史，故不追溯其起源至神話時代或倭寇活躍的時代。

11 此段文字主要參考英文版本後，改譯日文版本而成的。

論述世界史。這一組概念與上述地理意義的「海國」與「陸國」不必然有對應關係，但息息相關。例如：在19世紀帝國主義發展史中，英國無疑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俄羅斯則是最強大的「陸權國家」。其實，上述史密特的19世紀世界史敘述即主要針對此二國而論的。就此意義而言，史密特的世界史構想亦是歐洲中心的。但近代日本帝國的擴張亦是世界史的一環，只是其帝國主義發展是後進的、區域性的。近代日本亞洲論述的歷史意義之一，即在於合理化日本向侵入亞洲的歐洲、新歐洲的「海權國家」（英國、美國……）與「陸權國家」（俄國）的鬥爭。日本的鬥爭雖是區域性的，但同時在海洋與大陸上展開。

另一方面，在19世紀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中，從日本的角度看，19世紀時的中國是地理與認識論意義上的「陸國」（後述之「唐山」「唐土」「山國」之中國觀等），但非「陸權國家」。不過，中國是傳統華夷秩序中之核心國家，許多19世紀日本知識人依然警戒著清朝中國的軍事力量（松本三之介 2011：73-76），只是他們逐漸從文明發展史觀來將當時的中國視為固陋、停滯的「陸國」（*ibid.*: 60-63）¹²。此種中國觀是致使日本為取得市場與資源而向大陸擴張，欲成為「陸權國家」的原因之一。總之，從此一「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本文要從18、19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

事實上，如後述，大概從林子平(1738-1793)自覺日本為「海國」開始，日本知識人逐漸不再以封閉的「島國」之姿模仿彼岸「陸國」（林子平之語為「山國」）之政治與軍事等制度，而是改以渡海而來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為典範，向其周邊的海洋、大陸與島嶼擴張，與其他「海國」鬥爭。就此意義而言，日本的「海國」想像是與

12 當然，中國亦有「海國」的一面。事實上，從「海國」的觀點來理解中國，可得到不同於歐洲中心世界史敘述中的中國史觀（上田信 2005）。或者更進一步說，中國思想史內部自有向陸地或向海洋發展的路線競爭問題存在。

亞洲大陸的「陸國」差異化，是在理念上對歐洲（「海國」、商業文明）與亞洲（「陸國」、農業文明）間之文化疆界的發明，是其「脫亞」意識的根源之一，亦可謂是其在理念上成爲西洋的第一步¹³。這種文化疆界感覺的出現，除與前述之日本從海洋眺望大陸所形成的「山國」等固有地理視角的中國觀有關外，亦受到西方思想啓發而更加強化¹⁴。雖然在實質地理空間中，日本是屬於亞洲的（雖是歐洲人定義的），但在文化心理認知的層次，日本可以不屬於亞洲。此種思考的形成原因之一是，亞洲與歐洲的空間差異在文明發展史觀中可重構爲時間差異，然後文明發展史觀中歐洲與亞洲的差異亦在很大的程度可置換爲「海國」與「陸國」的差異，從而導出「海國」日本當先行「脫亞」的命題（後述）。但當日本企圖以「海國」之姿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有亞洲近鄰諸邦而已，是以「海國」想像和建構與亞洲論述纏繞在一起。

也就是說，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一種「興亞」論述）是奠基於「脫亞」意識、「海國」志向的¹⁵。就此意義，所謂的「脫亞」雖含有脫離與中國傳統密切相關的儒教的、農本的制度、思想等之意，但更主要的是指向對海洋、商業文明乃至海外殖民等的擁護（後述）。這一複雜思想狀況與發展當從江戶思想史內部來探究起。

-
- 13 本文所謂的「西洋」主要是指開啓近代文明、向外貿易、殖民，向陸地與海洋擴張的西方國家。其中有「海權國家」亦有「陸權國家」，或者兩者兼之。但開放的商業文明國家似乎是18、19世紀日本知識人理解西洋的一個主要面向。
 - 14 黑格爾的亞洲觀主要是，結合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以來的「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提出的「停滯」(stagnation)概念，而創造出世界史中停滯的亞洲觀念(植村邦彥 2006: 82)。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又在黑格爾的亞洲論基礎上，發展出貧困落後的亞洲觀(ibid.: 105)。這些亞洲觀直接或間接地束縛了近代日本知識人之思考。尤其需注意的是，黑格爾主要是以中國來理解東亞地區的(ibid.: 79)，這似乎亦給了近代日本知識人操作的空間。
 - 15 有學者將亞洲主義與近代日本侵略朝鮮、滿洲之北進的大陸政策連結在一起看，而與重視海洋的南進論區別開來(矢野暢 1979: 71)。對此，本文的立場是，不論是北進或南進，對於「海國」的自覺和以海洋爲媒介向其周遭區域的擴張正是近代日本亞洲主義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所以，本文將檢討林子平等江戶後期思想家的言論，以及明治以後的亞洲主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諸種「海國」想像與海外擴張主義，說明18、19世紀日本知識人對其「海國」形勢的自覺、各種言論中出現的「海國」想像之知識系譜，及其與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間的關連。藉此，希望能對近代日本亞洲論述之展開乃至當代東亞國際政治問題提供一種思考方向。

二、「海國」想像在日本的出現與展開：從防衛到擴張

(一)「海國」想像的出現：以林子平的海防論為主

在日本，朝向成為西洋的「海國」想像與論述大抵始於林子平《海國兵談》(1979[1791])¹⁶。子平在寫《海國兵談》前，寫了一本描寫日本周邊地理的《三國通覽圖說》。該書除「朝鮮」「琉球」外，主要介紹「蝦夷」的生活習慣、周邊地理等。他論及「莫斯科比亞」(俄羅斯)已統治「加模西葛杜加」(堪察加半島)，進而有進取千島、蝦夷國之意(林子平 1980: 35、36)。在此推論上，他更說日本與蝦夷是「唇齒之國」，但他不主張日本當與蝦夷合作，而主張日本當先「招諭」蝦夷，先開發、占領為日本領土(ibid.: 36-42)。

如上述，《三國通覽圖說》是為防衛俄羅斯而主張之積極的開發論、擴張論¹⁷。相對之，《海國兵談》則是採守勢的防衛論。在此書中他提出一個核心命題。那就是日本是周邊「四方皆海」的「海國」，

16 但林子平非第一個使用「海國」概念的人，早在林羅山(1583-1657)與朝鮮通信使的對話(李元植 1997: 135)，及荻生徂徠(1666-1728)的《政談》(荻生徂徠 1987: 82)中即已出現。

17 俄羅斯主要是從16世紀後半開始為捕獲毛皮獸而進出東方，在17世紀時征服堪察加半島，從18世紀時又沿千島列島捕獲海獺等而接近日本。尤其到了18世紀後期，俄羅斯人更要求與位於北海道南端的松前藩通商。在1771年時，日本更透過荷蘭商館的館長，收到俄羅斯將侵略日本的情報。儘管此情報後來證實是個偽情報，但大大刺激知識人對俄羅斯的關心，開始研究俄羅斯(生田美智子 2008: 9、10)。林子平即是其中一人。

不同於「唐山」「韃靼」等「山國」（林子平 1979〔1791〕：81）。林子平從此日本觀與中國觀中，提出幾個重要論點。首先，他說：「從江戶日本橋到唐與荷蘭間是無界線的水路也」（*ibid.*: 82）。在他看來，海洋雖是天然屏障，但亦是他國侵略日本的媒介。

再者，他觀察到清朝中國與明朝中國的不同。用他的話說，明朝是滅元而再興「唐山」者，清朝則是「唐山」「韃靼」「成爲一體」者，論道清朝有可能思及「元之古業」，渡海來侵略日本（*ibid.*）。又如前述，他對俄羅斯可能侵略日本的危機感亦是其著述《海國兵談》的重要動機。所以，他既警戒清朝中國，更警戒俄羅斯。故爲防止此二國入侵，他主張海防之重要性，且導出重要論點。即他認爲「海國」日本之軍政本該異於中國，歷代以來以中國兵書爲基礎所構築的軍事原理、技術當要導正，故《海國兵談》的第一篇是論「水戰」（*ibid.*: 87）。即在子平看來，今後日本的戰爭對手當非是日本國內對象，而是來自海外的異國人，海岸防衛、海戰技術和武器等才是重要的（*ibid.*: 87, 88）。總之，《海國兵談》標示著日本之學習典範的轉換，即從彼岸的「陸國」轉爲近代西方的「海國」。當然，這一轉換過程是漫長且複雜的。

但後來在1791年，子平因出版《海國兵談》一書遭受處罰蟄居自家，該書之印刻版本亦被沒收。諷刺的是，不久後在1793年乘載著漂流民大黒屋光太夫的俄羅斯船便來到日本要求通商（生田美智子 2008：18-24），於是年，子平亦在不得志中去世。隨著俄羅斯與英國進逼日本，海防思潮開始興起。古賀侗庵的《海防憶測》、會澤正志齋的《新論》等海防論、海軍論等紛紛出現。在此無法一一論述（眞壁仁 2007：284-350）。接下來，將檢討海外擴張論中的「海國」想像。

（二）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1)：本多利明

本多利明(1743-1821)與林子平一樣，是具明確國家意識的經世型民間蘭學者。但與林不同，是個數學家。他以數學爲基礎建構一種貿

易立國論，展開跨越海洋的交易論述，主張要以交易取「萬國之力」（本多利明 1970b：160）¹⁸。有意思的是，他主張海洋貿易乃「國君之天職」中最重要者（本多利明 1970a：32），即他主張一種國家統籌管理的海洋貿易。但另一方面，亦因其關心日本國內遊民與農民餓死等社會問題，才提出海洋貿易論來試圖解決¹⁹。就他看來，這些社會問題之所以出現在於國內之不足。他認為人口增加將導致生活資源不足，國內生產力亦必有個限度，故積極主張海外貿易之必要性（塚本晃弘 1970：456-459）。雖其經濟思想基本上立基於農業，但欲從與外國交易的海洋商業經濟來解決本國農業生產不足等問題。此乃其思想特點。

但本多的海洋貿易構想並非憑空而來，而是來自於蘭學的思想資源，來自於他對「歐羅巴」的理解與想像²⁰。中國則是其反面教師。對於中國，他認為過去日本之所以不知積極向海洋發展、開發屬島等是受「唐土」這一「山國」之聖賢教訓制約所致（本多利明 1970a：32）。故與林子平一樣稱「唐土」是「山國」，主張「海國」日本不當以中國為模範，而當以「歐羅巴」為模範。在他看來，「山國」與「海國」之差異不只是地理差異，更有地政學上的優劣差異。即他認為「唐土」是「山國」，因沒有全部被海洋環繞，故是地政學意義上的「惡國」，不如「海國」日本(ibid.)。

相對之，他雖知歐洲有許多獨立國家存在，但亦將之一體化理解，將「歐羅巴」理解為歐洲諸國之「總名」（本多利明 1970b：92），或總稱為「西域」「西洋」(ibid.: 111)。將之理想化為「只用

18 所謂的「萬國之力」乃指國家欠缺的產物與金銀銅等物質。

19 1782到1788年間日本東北發生史上最慘的天明大飢饉。本多利明在天明七年(1787)至東北旅行受到極大衝擊，在《經世秘策》中言及有二百萬人餓死之事和許多殺嬰等悲慘的情況（本多利明 1970a：27，亦參閱前田勉 2009：217）。

20 本多所參照的書有《阿蘭陀風說書》等第一手情報外，還有《新學藝大辭典》(Egbert Buys)、《家居纂要》(Noel Chomel)、《奇才秘函》(J.C. Ludemen)等辭書類之書，及其友山村才助《增譯訂正采異言》等介紹世界地理的書（犬塚孝明 1987：20-21）。

德而治」之國家(ibid.: 98)或將葡萄牙、英國理解爲利用海洋交易並「撫育土人」的「大良國」(ibid.: 112)。本多特別將英國視爲日本的模範，主張日本當開發、殖民與英國約略同緯度的堪察加半島(ibid.: 141, 160)。由於本多欲模仿的對象已轉爲具海外殖民地的歐洲「海國」之故，亦有開發日本北方與其周邊屬島之論，欲建構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圈(西岡幹雄 2000: 121-124)。但他欲開發之地不只是日本周邊諸島，更包括南洋諸島等(本多利明 1970b: 134-135)，欲將之收編爲日本的「屬國」。不過，本多主張殖民之地皆是文明尚未開化乃至發展之地，故他並非積極主張用軍事侵略的方法，強調用「撫育」「交易」的手段(ibid.: 148)。

總之，本多利明雖主張發展海外貿易，但他的海外貿易論是國家主導的經濟，故其日本貿易大國想像與其日本軍事大國想像一體²¹。但另一方面，他的對外擴張思想還是來自於其對日本國內農民之同情與其土地資源有限論等思想。這亦是幕末明治知識人之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中常見的思考模式。

(三) 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2)：佐藤信淵

另一個著名海外擴張論者是佐藤信淵(1769-1850)。他曾師事於平田篤胤，以得自平田的「皇國古道之學」中之「產靈」宇宙論爲基礎展開其宇宙論(子安宣邦 1977)。又再吸收蘭學等，建構其所謂的「家學」²²以解決日本國內外問題。較之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的世界圖像除得之於蘭學外，更得之於國學、儒學(特別是國學)。他以之爲基礎展開海外擴張論，在《混同秘策》開頭便道：「皇大御國是大地最初生成的國家，世界萬國之根本也。故能經緯根本時，則全世界悉爲郡縣，萬國君長皆爲臣僕」²³(佐藤信淵 1977a: 426)。這話說

21 在《經世秘策》最後一段中，他提出的理想目標是再興古代具「武國之高名的大日本國」(本多利明 1970a: 42)。

22 佐藤的著作內容繁多，主要是農業、經濟、軍事、醫學等多方面之著作(戶澤行夫 1972)。據傳其包括眾領域之「家學」已傳五代二百多年，但許多內容可疑。

23 原日文：「皇大御國は大地の最初に成れる國にして世界萬國の根本な

得十分狂妄，然有其內在的思考邏輯。首先，他要解決的是日本國內「經濟」問題。他所謂的經濟是「經緯國土、濟救蒼生」（佐藤信淵 1926：665）。那包括減少墮胎、飢饉等違反生之道（即「產靈」神意）的事（佐藤信淵 1926：668），故其致力於社會改革與農政經濟學。若僅從此點來看，或可說他是一個農學者、社會主義先驅，但他又講富國強兵論乃至誇張的日本膨脹論。從此點來說，他又可謂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其思想同時代具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個側面（碓井隆次 1971）。

然而，他的思想中這兩個面向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關鍵在於「經濟」一概念，他說「垂統」是「經濟」政策中最難的，但那是「讓國家永久全盛」的大法。在《垂統秘策》中，佐藤信淵論述其整個構想。主要是由所謂的「三台」「六府」所結構化的統治系統。其中與本文相關的是，他的統治構想中有「融通府」負責海外貿易，有「水軍府」負責海防與海外的侵略擴張（佐藤信淵 1977b：501-510）。在《混同秘策》則展開更具體的構想。在他的構想中，「安世界萬國之蒼生」乃「皇國」統治者之主要任務（佐藤信淵 1977a：426）。且因「皇國」是「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只要順從「產靈之法教」則必可順利征伐「蠻夷」，統一萬國(ibid.)。亦即「征伐」之目的乃是為救濟天下蒼生，此亦是「經濟」的最終目標。是以在「經濟」概念的思想發展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與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得以共存。

雖信淵之征伐、統一世界的構想極具空想性與強迫性，然那亦是在皇國世界觀與其對農業生產問題關心之基礎上，在十分自覺到日本是「四邊皆臨大洋」的「海國」地理形勢情況下發展出來的(ibid.)。他在《混同秘策》中主張首要征伐的國家是「支那」，並以爲「支那既入版圖」的話，世界其他國家便會慕「皇國」之德，畏「皇國」之威而漸自動臣服(ibid.: 428)。再者，他主張要取「支那」，必先取

り。故に能く根本を經緯するときは、則ち全世界悉く郡縣と爲すべく、萬國の君長皆臣僕と爲すべし」。

「滿洲」而後「韃靼」「支那」「朝鮮」可得(ibid.: 431)。另一方面，在《防海策》(1809)中，亦主張爲防「魯西亞」，當開發「蝦夷地」，攻取堪察加半島(佐藤信淵 1927a: 822)，但他認爲當更加小心防禦的對象是「大清國」，故暫且與之交易以「收互市之大利」(ibid.: 825)。亦即佐藤視清朝中國爲主要潛在敵人，但有時又據皇國世界觀，認爲日本可攻取之。又，他亦主張爲防在南方的英國勢力，故要殖民、開發「南海之無人島」(ibid.: 826-827)。在《西洋列國史略》(1808年著述)中更稱擴張中的英國今後必成「天下之患」(1927b.: 795)。

實際上，佐藤信淵心中認爲最需防衛的兩個國家在鴉片戰爭中衝突了。其後，因見識到大英帝國的強大，轉而在1849年發表《存華挫狄論》，認爲日本當助「清國」之復興以爲日本之「西屏」(佐藤信淵1927c: 866)。但所謂「存華挫狄」亦是僅在軍事方面言之，未提出具體計畫。該論的發表並不代表著佐藤之思想轉變，他只是想利用日本尙可攻取的「滿清」來防衛與日本同爲「海國」之「英吉利亞」而已(ibid.: 939)。鴉片戰爭並未因此改變他基於「產靈」宇宙論所發展出之皇國中心世界觀與「滿清」大國觀等基本思維，只更確認了英國今後必成「天下之患」的預測。所以，他與本多利明不同，不將西洋理想化，不將英國視爲模範，而是視之爲最大的敵人。更認識到日本與英國雖同屬「海國」，但日本的地理位置與農業物產更佳，若日本興航海通商之業，其便利性實「世界第一之上國」(佐藤信淵1927a: 821-822)。亦即信淵不僅認爲日本是一個不同於中國的「海國」，更是可超越同爲「海國」的英國。雖信淵之海外擴張論僅止於空想，但他的妄想的確刺激了海外擴張思想。在幕末時期即有人注意到他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吉田松陰。

(四) 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3)：吉田松陰

雖然在吉田松陰(1830-1859)之前，既有海外軍事擴張的話語出現，但推進幕末歷史前進的畢竟是參與政治的武士。吉田松陰便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位。他曾看過佐藤信淵《混同秘策》等書，但對其書評價不高，曾對其書其人說「喜其雄偉，而嫌其夸誕」(吉田

松陰 1986b : 197) , 並說 : 「觀一疑百, 吾之過也, 執一論百, 亦百祐 (佐藤信淵) 之過也」 (ibid.) 。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態度。如藤田省三指出的, 松陰基本上是個能快速把握狀況之改變而應對者 (藤田省三 2003 : 89) 。如許多幕末武士般, 其思想皆是對變化中之狀況的反映, 故顯得輕率或欠乏一貫性, 但具高度懷疑精神與戰略思維。本來, 幕末時期就是個情勢快速變動, 各種想法互相撞擊的時代, 身處於其中的知識人常不斷地更改想法。吉田松陰便是這一個時代精神的代表者。例如: 松陰在1850年平戶實際參觀過荷蘭船後, 認識到傳統兵學的局限性, 轉向學習「西洋」之「大艦巨砲主義」 (桐原建真 2009 : 31) 。

如上述, 在海外擴張主義這一問題上, 吉田松陰或可說是將佐藤信淵之妄想再加以更細緻地戰略性論述之人。後來, 在1854年的《幽囚錄》中, 吉田曰:

今急修武備, 艦略具, 礮略足, 則宜開墾蝦夷, 封建諸侯, 乘間加摸察加, 奪隴都加, 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 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 北割滿洲之地, 南收台灣、呂宋諸島, 漸示進取之勢。 (吉田松陰 1986a : 197)

此論或有受信淵之論的影響, 但重要的是區別兩者軍事擴張論之異同。兩者之同在於, 其軍事擴張論皆基於國學之皇國中心世界觀。兩者之異在於, 松陰繼承水戶學基於華夷意識的皇國史觀, 即瞭解到「古聖天子懾服蠻夷之雄略」是日本之所以為「皇國」的原因。故他從古代日本天子征伐四方的歷史記憶來主張日本中心性及日本作為一個「帝國」的獨立性, 而不講來自平田國學那套「產靈」宇宙論 (吉田松陰 1986c : 529) 。再者, 松陰認可日本是「海國」外, 更認識到世界已走入機械時代, 機械的蒸氣船 (火輪之舶) 使得歐洲由如比鄰 (吉田松陰 1986a : 595-596) 。所以, 其軍事擴張論並不那麼「夸誕」, 是基於其對古代日本天皇主政的輝煌歷史記憶與機械時代認識、「海國」想像而來的戰略論。

他認為日本為抵抗「西洋」當如西洋諸國般向外擴張, 當占取之地大都是位於日本周邊曾屬於「皇國」之國 (朝鮮) 或實質上是日本之「屬國」 (琉球) 乃至主權未甚明之地 (滿州、台灣等) 。但等

到1858年日美通商條約簽定之際，松陰則轉而強調若要重振「皇國」之「雄略」，當「航海通市」，實行自由貿易（吉田松陰 1986d：107）。在此，又一次思想的轉變。他認爲那是在面對懷領土野心之西洋列強進逼，在維持「皇國」之獨立目的下的「遠謀雄略」（ibid.）。

如上，吉田松陰的海外雄略論雖具某種程度之空想性，但確也是訴諸於歷史記憶以展現「皇國」「海國」之姿，去學習西洋、抵抗西洋以期超越西洋之論，是隨時勢變化且具行動精神之戰略論述。當然，幕末武士中之海外擴張主義者不只有松陰一人，吾人在橋本左內、島津齊彬等人的著作中亦可看到類似主張（古川萬太郎 1991：52、54）。但明治維新倒幕派中有許多志士皆松陰之學生，或受其精神之感召者多。在此意義上，其向外擴張的戰略思維足以代表幕末時期武士階層亞洲論述的一類型，而成爲明治思想之重要基礎²⁴。

總之，上述三位19世紀前期知識人之知識背景、思考邏輯、對西洋之認識等並不盡相同，但其言論之主要目的皆在於擺脫封閉的「島國」意象，脫離主要以農業爲生的「陸國」狀態，防衛或解決日本內部之經濟問題。亦即他們的論述皆希望日本往商業文明國家意義的「海國」發展。而且，從以上的論述亦可知這些追求日本之獨立與擴張的思想皆不免以軍事爲手段，且訴諸於海外的殖民。後述之明治前期的「海國」想像話語大抵亦如此。只是隨著海軍的近代化和其與陸軍的軍備競賽、對外戰爭的勝利、海外殖民地的實現等歷史事件的發生，軍事擴張本身將漸被目的化，使問題更形複雜。

三、明治時期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的興起：以東邦協會爲主

由上所述，可知在明治以前，日本知識人已開始從日本的地理特點來想像日本是個「海國」，以差別化彼岸的「陸國」。接下來，將

24 另一類型是結盟主義型亞洲論述（藍弘岳 2011）。

檢討「海國」想像如何與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發生掛勾？

(一) 征韓論爭與亞洲主義團體的出現

征韓論爭是明治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其思想源流至少可上溯至前述之吉田松陰海外雄略論（吉野誠 2002：53-78），亦是使之後的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得以成形的契機之一。因明治初期維新外交的基本構想是與王政復古思想連動的，故朝鮮曾從屬於「皇國」的歷史記憶復活，維新政府以不對等的方式對待朝鮮王朝，在其對朝鮮的外交文書加上「皇」「勅」等文字，但這被朝鮮王朝以不同於江戶時代外交形式的理由拒絕了。該結果引發一連串外交折衝與論爭（吉野誠 2002：81-114）。後來發生明治六年政變，促使維新後的藩閥政府大分裂，西鄉隆盛下野、征台之役（出兵台灣）、江華島事件、以及西南戰爭等明治前期的大事件發生。

其中，因征韓論爭下野且又為不平武士戰死的西鄉隆盛更因之成為後來民間的不平武士、具天皇中心思維且重國權的右翼思想家與團體所崇敬的對象（松浦正孝 2010：99-102）。其實，征韓論意味著明治初期外交路線之爭。西鄉所代表的就是一種基於天皇中心之王政復古理念（名分條理）的亞洲外交政策路線，該路線在征韓論後即已告終（吉野誠 2002：206-209）。但天皇中心之亞洲連帶思想並未消失，而是轉入民間。另一方面，在征台之役與江華島事件中，明治政府成功地以萬國公法處理亞洲事務。這些事件象徵著日本往加入近代西方國家體系這一目標邁進一大步（吉野誠 2002：170、171）。之後，在這一外交行動原則主導下，日本成功成為近代西方國家體系中之一員的同時，亦逐漸在該體系內部構築一以亞洲太平洋為範圍的區域霸權體系。是以，天皇中心且具擴張主義思維的亞洲主義思想便在民間與政府的曖昧地帶，以學術團體、民間雜誌等的方式複雜地展開²⁵。

25 儘管日本政府並不承認亞洲主義為政府之正式政策，但的確是二戰中與之前的日本政府隱藏政策原理（山室信一 2001：573-578）。

在1898年明治時期最大的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成立之前，已有振亞會（1877年設立）、興亞會（1880）、亞細亞協會（1883）、東邦協會（1891）等亞洲主義團體（狹間直樹 2001）。其中振亞會、興亞會、亞細亞協會在組織、人脈、目的上皆有著繼承關係。核心人士皆是曾根俊虎、副島種臣等人。其主要目的皆是在於亞洲內部的日本與清朝中國間的語言教育與通商貿易的發展。相較之，東邦協會的組織成員雖與亞細亞協會有所重複，但其發起人不同。而且，相對於亞細亞協會，該會被理解爲保守分子居多的團體（《每日新聞》，明治24年7月18日）。不管如何，東邦協會可說是最立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主義團體²⁶。其共同關心的領域不只是「東邦」（東洋）亦包括了「南洋」地域。故以下以其主要成員之活動爲中心來檢討明治時期與「海國」想像相關的亞洲論述。但在之前，筆者想先釐清本文所論及之亞洲論述與「脫亞」思想、「海國」想像等三者間的關係。

（二）亞洲論述與「脫亞」思想、「海國」想像：以福澤諭吉之論爲主

首先，說到「脫亞」，相信大家都會想起福澤諭吉（1830-1901）。但他在提出〈脫亞論〉（1960b[1885]）前，在《時事小言》（1959b[1881]）中提出過亞洲連帶論（一種「興亞」論述）。其實，兩者並非針鋒相對的兩種論述，福澤諭吉亦非是從亞洲連帶者轉爲脫亞論者。如坂野潤治所指出的，吾人在理解近代日本知識人之外交論述時，不該將「脫亞」或「亞洲連帶」、「日清提攜」等語言表現直接理解爲作者之思想，而是要就當時的國際情勢去分析其對外認識來把握其「思想之實像」（坂野潤治 1977：13-20）。而且，他亦認爲吾人在討論近代日本知識人之亞洲論述時，他們對同爲亞洲中之「中國」與「朝鮮」之認識當要分開來看，否則往往無法釐清問題（ibid.：25-29）。如福澤在《時事小言》（1881）中所主張的亞洲連帶論是一種朝鮮改造論，是與日清提攜論（另一種亞洲連帶論）相對立的主張，

26 關於東邦協會之研究文獻不多，除前列之狹間直樹之論外，最全面且基礎的研究是安岡昭男的研究（安岡昭男 1998），但該文並未從此觀點來論述東邦協會。

而其後的〈脫亞論〉則是在壬午事變(1882)、甲申事變(1884)後，在基於朝鮮國內親日派失勢後的現實狀況認識中提出之現狀維持論，而非一般所理解的亞洲侵略思想開端(ibid.: 29-57)。其實，若就其思想是侵略主義與否而言，其〈脫亞論〉前的朝鮮改造論更具侵略性(ibid.: 57)。

姑且不論〈脫亞論〉是在何種國際情勢中所發的。該論受到重視是在二戰後的1950年代末期，且福澤亦非使用「脫亞」這一概念的第一人，更沒有說過「脫亞入歐」(丸山眞男 2009: 5-12)。「脫亞」或「脫亞入歐」之所以在戰後會受到注目並廣為使用，大抵是因這兩個概念畫龍點睛地表現了明治以後日本的主流思想發展方向。所以吾人當區別在國際政治情勢中之〈脫亞論〉本身與「脫亞」所代表的思想傾向。若吾人就思想傾向來理解「脫亞」，「脫亞」之意當如福澤在〈脫亞論〉中說：「國中朝野無別，一切萬事採西洋近時文明，不僅獨脫日本之舊套，亦在亞細亞全洲新出一機軸以爲主義」、「國民精神既脫亞細亞之固陋，移向西洋文明」(福澤諭吉 1960b: 239)。就此意義而言，早在福澤提出〈脫亞論〉以前，其以西洋文明爲模範改造日本國家乃至「國民精神」之文明論思想就已是「脫亞」的。其思想內容一方面是指向培養人民智德，改造「國民精神」外²⁷，另一方面亦是指向進入主權國家體系中，學習「文明」的國際權力政治之規則²⁸，並以之爲基礎，成爲海外貿易、海運、海陸軍發達的開放「海國」²⁹。在福澤看來，沒有軍備爲後盾，則「萬國公

27 這是1875年初版已出之《文明論之概略》的中心思想。其四、五、六、七章討論的就是「智德」的問題(福澤諭吉 1959a)。

28 初瀨龍平在〈「脫亞論」再考〉(初瀨龍平 1984)一文，就是從此觀點來論述的。

29 福澤在文章中，他數度論及「海國」一詞。如下例文：「我海國の人民は坐してその船の出入を傍觀するか、或は之に依頼して船客たるのみ。之を海國の恥辱と云うも可ならん」(我海國人民可坐而傍觀其船之出入，或只可依頼之而爲船客而已。此可謂海國之恥辱矣)(福澤諭吉 1959b: 182)、「海軍の不完全なるに至ては陸軍より更に一層の甚しきものと云ふ可し。四面海にする海國にして海軍の欠く可らざるは其理由を言ふも迂 ならば唯讀者の自知に任じ……」(海軍之不完備可謂更甚

法」亦不可靠，要發展軍備則需資本（福澤諭吉 1959c：304-306）。其中，海軍的整備更是急迫。亦即福澤之「脫亞」思路是朝向成爲近代西方式主權國家、商業文明乃至「海權國家」發展的。是以，「海國」想像包括在其「脫亞」思想之中。

事實上，福澤諭吉的文明史論受到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近代西方知識人之文明史論的影響，從而形成落後停滯的亞洲觀（植村邦彦 2006：147）。但對西洋文明論中之停滯、專制的亞洲觀，福澤是有所批判的，否則他如何能告訴日本人民，位於亞洲之日本能成爲文明國？爲此，福澤必須去論述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差異。他常操作的是亞洲儒教文化與日本武士風俗差異的對比方式，強調武士風俗對日本文明化的正面作用（松澤弘陽 1993：331-342）。

除此之外，文明的商業社會與半開的農業社會亦是另一組可操作的對比概念。在《文明論之概略》中，福澤將世界文明分爲「文明國」、「半開之國」、「野蠻之國」（福澤諭吉 1959a）。其中，「文明國」與「半開之國」之國的差異之一即在「文明國」是工商業發達國家，「半開之國」則是農業之國(ibid.)。若將福澤諭吉之文明發展史觀中「歐羅巴」與「亞細亞」的差異置換成商業的「海國」與農業的「陸國」之差異，則可導出地理意義的「海國」日本容易發展爲自由貿易的「海國」，從而徹底成功「脫亞」的命題。雖在《文明論之概略》中，福澤沒有積極地從此組概念的對比去論述日本的特殊性，但從上述之福澤的「海國」想像中，亦可知這樣的思考存在其思想中，且其文明論實際以成爲「亞細亞東邊」的「新英國」爲目標

於陸軍。作爲四面濱海之海國，言海軍不可缺之理由亦迂濶，唯任讀者之自知……」（福澤諭吉 1959c：319-320）、「四面海に浜する海國にてありながら稀に軍艦の遠洋に航するのみにして、海外の諸港に向て定期の郵船もなく、貿易は自國の開港場に於て外商の來るを待つのみにして、……」（作爲四面濱海之海國，軍艦卻甚少航至遠洋，亦無航向海外諸港之定期郵船，貿易只能等待來本國港口的外商……）（福澤諭吉 1959d：149）。綜而言之，在福澤看來，日本身爲「海國」當有發達的海運以展開海外貿易，並有強盛的海軍以防衛國土、支援海外貿易的。

的（福澤諭吉 1960a：145）³⁰。順此邏輯，亦可導出日本當以亞洲中的先進「海國」、文明國之姿來「興亞」的命題。正是在此意義上，福澤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史論與「脫亞」思想在明治以後，成爲多數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之思想前提。所以，雖然福澤諭吉非東邦協會成員，且其〈脫亞論〉亦不同於東邦協會之「興亞」論述，但多數東邦協會成員當共有「脫亞」的思想傾向³¹。他們皆希望日本朝「海權國家」的方向邁進。以下，就此理解來探討東邦協會的亞洲論述。

（三）東邦協會與《東邦協會報告》略論

東邦協會是由小澤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誠（福本日南）在1890年1月發起，在小山正武、山口宗義、陸實（陸羯南）、矢野文雄、小村壽太郎、高橋健三等人的贊同下，在同年11月成立的。一開始會長從缺，1892年副島種臣昇任會長，直到1905年去世爲止。之後，近衛篤磨、黑田長成、加藤高明相繼任副會長。黑田更在副島之後昇任爲會長（安岡昭男 1998：217、218、223）。該會雜誌《東邦協會報告》（以下，略稱爲《報告》）³²則開始於1891年5月，發到38號後，在甲午戰爭開始（1894年8月）之時即改名爲《東邦協會會報》，直到1918年3月的231號爲止（安岡昭男 1998：234）。

東邦協會所謂的「東邦」當是「東洋諸邦」的簡稱，其所指的範圍並不明確，但當主要指日本在亞洲東方的「近鄰諸邦」，即中國、朝鮮、俄羅斯與「南洋諸島」等。故《報告》中所謂的「東邦」或「東洋」當包括北從俄羅斯、南到澳洲的西太平洋沿岸與離島的諸國家，但該《報告》所論的範圍廣大，有時亦論及印度、波斯等亞洲國家問題。其成立宗旨在於促使明治知識人不只要學習西洋，更要認知到以「東洋之先進」自任的「日本帝國」需詳知「近鄰諸邦之近狀」，對外擴張實力，以求與「泰西諸邦」之均衡，故致力於紹介

30 福澤心中理想的政體亦英國的議會內閣制。不過，這是另一層次的問題，將另撰稿論之。

31 「脫亞」思想並非始於福澤諭吉，伊藤博文等明治的政治家們或多或少皆有此思想（芝原拓自 1988：469）。

32 本文利用的是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收藏版。

「東南洋」相關事物（東邦協會 1891a：1-4）。即該會是一個研究亞洲太平洋地理、貿易、歷史等的學術組織與平台等。但吾人當知，該學術關心的背後有著強烈的政治意圖（東邦協會 1891b：111）。

又，該會成立目的背後，更可觀察到一部分明治知識人對歐洲人已開始研究「東洋」的危機感與不滿。他們認爲「國於東洋」的日本更有資格研究「東洋」，具「補翼東洋之文化」的任務（東邦協會 1891c：10）。爲上述目的與任務，該會便每月發行《東邦協會報告》。該《報告》第一號第一、二、三編是〈南洋兵備提要〉、〈濠州航海記事〉、〈東洋及南洋地誌〉，似乎比起東洋諸國，南洋諸島的狀況更是他們關心的焦點。他們所認識的亞洲亦不是集中於東亞。在〈東洋及南洋地誌〉一文中使用的「亞細亞」大抵與現在認知的範圍差不多，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將亞洲的面積與人口分爲「日本帝國」、「支那帝國」、「土耳其帝國」三大獨立國與「露西亞」（俄羅斯）所統治的「露領亞細亞」與英國統治的「英領亞細亞」兩大領土國來理解。也就是說，對東邦協會的編者群而言，亞洲當然必須包括「陸權國家」俄羅斯與「海權國家」英國在內。他們的亞洲論述大抵將俄羅斯視爲北方防禦的假想敵，故非常注意西伯利亞、千島群島等地的情況及俄羅斯之海軍的發展等，甚至設立俄羅斯語學校。而在他們有意染指的南洋，英國便是主要的對手。亦即在19世紀後期，日本在向外擴張，成爲「海權國家」後，勢必與英國及俄羅斯直接競爭或與之合縱連橫。

如上所述，《東邦協會報告》決不是局限於日中、日韓間關係的議論，更包括西伯利亞與南洋乃至波斯問題，及日俄、日英乃至日美關係等的議論，亦包括國際法、歐美各國之外交政策、殖民貿易之事（東邦協會 1891d：139）。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議論中，日本被積極想像爲一地理位置優越的「海國」。特別是英國被視爲日本之模範國家。實際上，明治日本之海軍制度等即是學習英國的（池田清 1981：146-156）。在《東邦協會報告》又有許多與海軍相關議題³³。一篇

33 〈海軍比較〉（《報告》3號）、〈露國の海軍〉（《報告》6號）、〈現

名為「海軍」的文章更明言若日本欲成為「西太平洋上平和的擔保者」，當擴張海軍（東邦協會 1891e：1）。除此之外，海運、殖民等亦是其關心焦點³⁴。

總之，東邦協會所關心的議題五花八門，無法在此一一檢討，其成員的思想亦不一定一致。但如上述，促進日本政府與知識人對亞洲太平洋的認識乃至政策的形成當是其主要的目的。雖自稱是學術性組織，其與政治的掛勾的情況明顯。如副會長近衛篤磨是貴族院院長，後來的副會長加藤高明是促進日英同盟的外相外，後更官至總理大臣。該會乃至其主要成員對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對外擴張政策的形成當有發揮一定的影響。接下來，檢討其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

（四）東邦協會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福本日南、陸羯南、近衛篤磨

福本日南(1857-1921)是東邦協會發起人之一。海外殖民是他主要關心的課題。例如他在1886年寫下《樊噲夢物語：一名新平民回天談》(1886)一書中，異想天開地敘述著日本的部落民移民到菲律賓，然後與菲律賓人推翻西班牙殖民政權的故事。其內容有得自西洋的民權思想，又有著抵抗西洋以伸張日本之國權與復興亞洲的思想（福本日南 1886：32-39）。在1888年日南撰寫「人口之蕃殖」一文，更直接表明海外殖民之志。在該文他提出「興地力」、「興工業」、「興移住殖民之業」這三個解決當時日本人口壓力的方法，但主張只有第三個才能根本解決問題，且他認為殖民有助於日本之航海貿易擴張³⁵。

日南的「海國」論述明顯地繼承著林子平以降的「海國」論述，

時海軍情勢一斑》（《報告》13號）、〈東洋に於ける露西亞海軍の挙動〉（《報告》16號）等。

34 在《報告》12號中有〈吾國海運の沿革〉一文，主張「吾邦振興の策一に海運の隆盛を計るにあり」（吾邦振興之策一在圖謀海運之隆盛）（頁2）。在〈海國史談〉（《報告》，17號）中亦主張「貿易航海は吾邦富強の礎」（貿易航海乃吾邦富強之基礎）。

35 出自《東京電報》，1888/11/8-9。本文轉引自廣瀨玲子(2004: 124,125)。

更有著吾人在本多利明等人思想中看到的將國內問題移往海外解決的思路。他在1892年《日本》這一報紙上寫了題之爲〈海國政談〉的一連串文章，後集結成《海國政談》（福本日南 1892）。在其中，他就表明是在繼承林子平之志的意圖下寫的。只是相較於林子平所講的是「海國之兵政」，他要講的則是「海國之財政」。其論述不只重視軍事防衛，更重視貿易的擴張。他主張「文明之在交通」「富強之本在交通」（福本日南 1892：4），特別強調海運發展的重要性，認爲海運發展有利於人與物的流動，乃至有助於貿易權與海軍的擴張。他希望日本能成爲一個在經濟上掌握太平洋霸權的「海國」（廣瀨玲子 2004：310-323）。此外，他同樣是以英國爲日本國家發展的模範對象（ibid.：265-344）。且值得一提的是，福本日南之「海國」論是在與其他當時的國粹主義者對話、交流中產生的。顯然，在甲午戰前，有關「海國」的討論既已熱烈展開（ibid.：123-197）。在之後，相關討論，更有增無減。例如：當時的重要雜誌《太陽》在1902年第8卷8號中制作「海之日本」特集³⁶。

但另一方面，後來，日南又從「人道」的觀點，批判導致日本海軍擴張之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權論中的「制海權」觀念（福本日南 1903），亦反對軍事侵占中國。不過，他支持日本對清開戰，認爲對清開戰有助於使中國覺醒，也從其「海國」視角出發，贊成日本在中國的「商工業之平和擴張」（福本日南 1900）。也就是說，福本主張一種允許日本經濟擴張的支那保全論（廣瀨玲子 2004：191-197）。在日俄戰爭後，更主張成立「日英清之三國同盟」（ibid.：338-342）。然其論中明顯存在著日本是文明先進國之優越意識與對清經濟擴張的思考邏輯。

另外，亦是東邦協會會員的陸羯南(1857-1907)亦有類似看法。如

36 在明治後期，除《海國政談》外，至少有以下以「海國」爲名的書籍：《海國急務》（藤川三溪 1886）、《海國》（曾良鉉三郎 1892）、《海國偉人傳》（石井研堂 1896）、《海國男兒》（江見水蔭 1901）、《海國史談》（足立栗園 1905）、《海國日本》（伊藤銀月 1905）、《海國男兒》（西尾麟慶 1910）等。

本文一開頭既已言及，陸羯南在1902年寫〈島國與海國〉一文，主張日本當發展為「海國」。對於甲午戰爭，他以「文明」之名正當化之（陸羯南 1894：563）³⁷，在甲午戰後亦與日南一樣，展開海外殖民與海運、海軍論一體的論述。他雖主張日本當保有朝鮮，但又主張「北守南進」（對俄協調），反對過度的軍備擴張，但贊成日本在中國之經濟擴張（朴羊信 2008：61-106）。在1998年的美西戰爭後，更對原本視為「博愛主義」之國的美國失望，批判引導美國從19世紀末開始擴張的海權論為「野蠻」「紀元前之舊思想」，感嘆「野蠻亦是文明之道理何在」（陸羯南 1899：220）。

對此，吾人不禁疑問的是，何以陸羯南（或包括日南）即一方面以「文明」之名批判美國的擴張思想，但又以「文明」之名正當化對清戰爭？此種日本中心的雙重標準似乎是大多數近代日本亞洲主義所面臨的問題（朴羊信 2008：143、144）。僅就陸羯南與福本日南的情況而言，其中的一種可能解釋是，他們以「海國」日本已達成有形文明（國家形式、制度等）的角度來主張日本的優越性（與「西洋」的類似性），同時，又以無形文明（「人道」等）來批判「西洋」的野蠻，強調東洋的一致性。關於前者，「海國」的地理狀況與武士風俗等，是其可強調的日本與亞洲諸國差異之處，是「脫亞」意識的思想依據。後者可謂是來自他們的漢學教養，是一種可強調日本與其他亞洲諸國關係的「興亞」思想依據。近代日本亞洲主義當是，以與「海國」想像相關的「脫亞」意識為思想前提，但亦在與漢學教養相關的「興亞」心態中成長的。

另外，吾人在東邦協會副會長近衛篤麿(1863-1904)的身上亦可看到類似的心態³⁸。他在甲午戰後發表的〈關於海國勃興之要務〉（海國の勃興に關する要務）一文中，主張「海國」日本之「興國根本策略」是「謀海運之發達」使「殖民政略實行」、「通商貿易旺盛」，

37 福澤諭吉、內村鑑三等明治知識人之立場亦是如此（米原謙 2002：176-178）。

38 不過，就具體的亞洲連帶論內容而言，近衛與陸羯南等人之論是有差異的（坂野潤治 1977：85-108）。

並認爲日本當「以商工實霸東洋」，當「有收東洋之海上權爲我之必要」（近衛篤磨 1895：13）。篤磨的「海國」想像正是促使他從商業利益之角度提出「亞細亞之門羅主義」的原因之一。

所謂「亞細亞之門羅主義」是近衛在1898年10月與康有爲對談中主張的。他說：「歐洲列強皆爲自己之利害而在東洋相爭。東洋乃東洋人之東洋，東洋人不可不有獨決東洋問題之權利。美洲門羅主義，蓋不外乎此意。於東洋實行亞細亞之門羅主義，其義務實由貴我兩邦肩負。現今局勢此事已不易行。但我最終目的卻不可不爲此」（近衛篤磨 1968：195-197）。在此段話中，篤磨以美洲門羅主義爲模範，提出亞洲門羅主義的主張。所謂的美洲門羅主義是以隔離、孤立爲原理建構的國際秩序原則之一。那是相對於舊大陸，作爲一個正義、公正等價值支配的新天地美國之自我形象的表現，具有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平石直昭 1998：184）。然而，當在19世紀末美國亦開始進入海洋，成爲太平洋國家。這一美國的轉變亦觸動了篤磨提出亞洲門羅主義。

其實，篤磨主張的亞洲門羅主義主要是〈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之必要〉（近衛篤磨 1898）中之「支那保全論」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在該文他從「人種競爭」的觀點來主張日本與中國間成立「同人種同盟」的必要性，認爲日本當阻止中國的分割危機，方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即軍事防衛與日本商品市場的利益。所以，篤磨的人種論述只是手段。其實，該論發表不久後，他便不再強調「人種」，而改講「東洋文化」（大內暢三 1934：146）。不管如何，其目的還是對西洋列強之軍事防衛與其貿易利益，其背後更有日本已是文明先進國，要讓同具東洋文化的中國化育於文明的優越意識（近衛篤磨 1895：1）。正是這些目的與優越意識上，近衛篤磨開始主張亞洲門羅主義。

總之，這些立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論述是，在具體主權平等的近代國際關係中展開追求國家利益的論述。但他們主張日本當從「島國」變身爲「海國」，而「海國」想像確將他們導向認同經濟擴張之路，而爲此目的有時軍事侵略亦是可默認的。亦即19世紀日本的「海國」想像主要是希望將日本建設爲經濟大國，但亦不可避免地將日

本導向「海權國家」之路發展。其所導出的亞洲論述主要是以經濟擴張為目的，軍事服務於此目的。但在後述之「海權」、攻勢國防等觀念的啓發下，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的亞洲論述亦漸漸往合理化帝國之軍事擴張的方向發展。

四、海權思想與近代日本之軍事擴張主義、亞洲論述

東邦協會促進日本的「海國」想像與發展的重要事跡之一是，對馬漢的*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日譯本為《海上權力史論》）³⁹的譯介。眾所周知，在甲午戰後，日本開始殖民台灣，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前後，世界亦發生夏威夷革命(1893)、美西戰爭(1998)等大事件，美國在19世紀末亦改變其外交策略，欲成為「海權國家」。其背後的思想主要有著《海上權力史論》等論著的影響。他的書快速地在世界各地流行，而他無疑是20世紀美國帝國化的主要理論貢獻者之一(Connery 2001: 183-184)。

該書是在1890年出版的。在第一章中，馬漢從貿易通商角度來主張發展海運、殖民地的必要性，並強調海軍擴張之必要。並用「海權」（「海上權力」、sea power）這一概念建構其地政學理論。他以影響海權的六個條件（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範圍、人口、民族特點、政府的特點和政策）及三個影響要素（生產、海運、殖民地）的連鎖效應來說明「海權」。然後在其他章節，他通過對歐洲、美洲之海戰史的討論來說明「海權」的重要，並主張美國的模範當是擁有最強大海權的英國。其實，他所謂的「海權」不只是指以武力支配海洋的軍事勢力，更包括為保護海運、貿易、市場而建設之海軍相關設施等，特別重視通過運用優勢的海權與戰術來獲得「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最先將馬漢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是，1890年時正在美國旅行視察

39 馬漢，《海上權力史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水交社譯，東京：東邦協會，1896）。

的金子堅太郎(1853-1942)。他將該書帶回日本，在該書在美國、歐洲獲得廣泛的讚賞之後，抄出該書第一章給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載於《水交社紀事》(1893年，第37號)。該文隨即轉載於《東邦協會報告，第28號》(1893年8月)中，題之爲〈海上に於ける國權の要素〉(海上國權之要素)。後來在《東邦協會報告》第29及第31號中，又刊出東邦協會重要成員且後來任海軍大學校校長的肝付兼行所譯的第一章，題名爲〈海上權力の要素〉。之後，1896年水交社即譯出全文，由東邦協會發行出版，題名在《海上權力史論》在短短兩天內就賣出數千本(麻田貞雄 2010: 15)⁴⁰。

(一) 海權思想與近代日本海陸軍的軍事擴張主義

東邦協會會長副島種臣在《海上權力史論》序文中，就直接說「外交術與海軍力謂之制海二要素，吾國『海國』也」，認爲日本若能掌握「制海權」，就能支配海洋的貿易通商。亦如前述，陸羯南等人亦當讀過該書。不過真正受到刺激的當是日本海軍，他們將之運用於海軍擴張之方向。

首先，肝付兼行在《海上權力史論》的序文中，力陳對海軍的發展而言，除日新月異的技術外，從過去的歷史中提煉出原則，開發知識以在實戰中應用亦是重要的。他從此觀點肯定馬漢《海上權力史論》的重要性。

再者，將馬漢的理論按日本地政情況改編的是佐藤鐵太郎(1866-1942)。他曾任海軍大學校長，對明治後期以後之日本海軍政策有重要的影響。佐藤在1892年所寫的〈國防私說〉中，即從地理與經濟等原因力陳「海國」日本的國防當是海主陸從(石川泰志 1995: 7)。後來，佐藤又寫《帝國國防論》(1902)與《帝國國防史論》(1910)等書。在上述兩書中主張日本的學習典範當是同爲「海島國」的英國，又導入馬漢的「制海權」等爲核心概念建構其國防論，認爲日本國防不管是攻擊或防衛皆都應有強大海軍以護衛陸軍，改以「海主陸從」

40 順便一提，《海權論》傳入中國亦是經由日本媒介的，相關研究參閱(周益鋒 2006)。

爲主（麻田貞雄 2010：48、49）。《帝國國防史論》至1912年又增補成《帝國國防史論抄》。該書出版後到太平洋戰爭前一直是日本海軍的必讀經典（麻田貞雄 2010：50）。

衆所周知，海軍與陸軍之爭是日本近代史，特別是軍事史中一個極重要問題。基本上，一直是陸軍的陸主海從政策主導的。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在獲得滿蒙權益，〈帝國國防方針〉確立之後，雖因假想敵的差異（大抵是陸軍以蘇俄，海軍以美國爲假想敵），陸海軍日益對立，互相競爭軍備擴張，但陸主海從的大陸帝國發展方向已然確立（北岡伸一 1978：9-17；石川泰志 1995：32-33）。佐藤等人之論當是在這一背景中，力抗主流政策的論述。佐藤雖反對向大陸擴張，但主張軍備之目的爲維持平和與擁護「國體」，且認爲當擴張海上權力以求「自強」與「將命」（應天之明命）（佐藤鐵太郎 1910：86-89；1912：78-82）。雖佐藤將重點放在「自強」，但事實上，如同英國一樣，只要有強大的海軍力，就可能支配世界的海洋，在世界各地殖民。這亦是「將命」所潛藏之意義。

實際上，對於中國，他雖反對占領滿蒙，但主張如英國對印度一樣，以讓中國大陸之軍自己防衛，然後日本執其牛耳（佐藤鐵太郎 1912：525-555）。就北進與南進的論爭而言，佐藤之論無疑地是導向和平的南方發展的海洋立國論，且影響了山本權兵衛（1850-1933，第16、22任首相）等人（池田清 1981：115）。另外，對於美國，他則主張互相提攜以維持太平洋的平和（佐藤鐵太郎 1912：505-513），提出一種太平洋海洋國家連攜論。此種論點現已爲當代日本的海洋國家同盟論所繼承（渡邊利夫 2008）。但另一方面，他也悲觀地看待日美關係，認爲兩國可能在中國利益與太平洋霸權的問題上，終需一戰（佐藤鐵太郎 1912：509）。

總之，較之馬漢，佐藤之論雖更重防衛與平和之論，但亦非單純的反擴張主義、反殖民之論（佐藤鐵太郎 1912：548）。從佐藤之例可說，海軍擴張論不必然導向軍事侵略論。從另一角度看，制海權的觀念與海軍的擴張雖可導向重視平和與防衛論的一方，但對主張向大陸擴張的一方更是需要的。事實上，佐藤之後繼任海軍大學校長的

加藤寬治亦利用馬漢之論正當化海軍的軍事擴張，並配合陸軍之大陸擴張政策，展開大海軍主義，並在此基礎上，主張以日本爲盟主之亞洲門羅主義（加藤寬治大將傳記編纂會 1941：577-578）。而且，陸軍也不必然反對海軍的擴張。陸軍大老山縣有朋在其1890年提出的〈外交政略論〉中，提出的主要課題之一即是海軍的擴張（山縣有朋 1966）。當注意的是，該論亦是日本從守勢國防轉向攻勢國防的轉捩點（村中朋之 2005：109-111）。山縣亦是在此一思想基礎上主導日本在1907年制訂上述〈帝國國防方針〉的。在此陸主海從的國防方針中，海軍的海權思想不得不爲陸軍之「陸權國家」欲望服務。

（二）海權思想與德富蘇峰の軍事擴張主義、亞洲論述

再回到馬漢的海權論來，該論不僅影響日本海軍，亦影響德富蘇峰(1863-1957)等民間知識人。德富蘇峰早在明治20年代初期(1888)左右就開始主張對外擴張主義，更在甲午戰後發生的三國干涉還遼問題爲契機成爲帝國主義者(德富蘇峰1935：310)⁴¹。約莫在同時期，他亦注意到馬漢的海權論，在1894年10月24到11月1日的《國民新聞》中連載肝付兼行介紹馬漢海權論的社論〈海上之權力：肝付海軍大佐之意見〉。在這一年，德富蘇峰的名字亦出現在《東邦協會報告》第一號（1894年8月）上面，成爲會員（安岡昭男 1998：228）。甲午戰後，他亦將其在戰爭前後發表的論文結集成書出版，書名爲《大日本膨脹論》。此書將甲午戰爭導往日本向大陸擴張的機會理解，故對後來日本之帝國意識的形成有重要影響（瀨瀨厚 1994：32）。又，他在〈戰爭に伴ふ顯象〉（伴隨戰爭之顯象），《國民の友》第240號，1894）等社論，主張日本當取代英國成爲「東洋之霸權」。隔年，他在〈合衆國之外交〉（《國民の友》第273號，1895）一文中，討論美國進出太平洋的可能性，主張日本的資本家當掌握太平洋霸權（澤田次郎 2011：140-141）。在日俄戰後，蘇峰更認爲日本當從「島帝國」成爲「陸帝國」（米原謙 2003：174）。不可否認地，

41 但是其膨脹思想非突然出現，而在之前已醞釀，相關研究參閱米原謙(2002: 152-204)。

諸如此類的主張，在某種程度鞭策著日本往大陸擴張之方向前進。

也就是說，隨著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德富蘇峰不僅認為日本當成為「海權國家」，更當成為「陸權國家」。在這點，蘇峰的思想顯現出與前述的佐藤鐵太郎的差異，成為一個與陸軍主流派一樣的大陸擴張主義者。此種大陸擴張主義亦是以「海國」想像為基礎的。因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蘇峰雖認為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方面有所衝突，但因有俄羅斯這一共通敵人，故亦是日英或日美同盟的贊成者。其背後的理由便是同為「海權國家」的日本與英美聯合以共享在中國的利益，以抗「陸權國家」俄羅斯（澤田次郎 2011：218）。另一方面，在此一觀點上，他亦反對近衛篤磨所提的日清同盟論，認為該論會加劇歐美的黃禍論（澤田次郎 2011：219）。有意思的是，馬漢在《海上權力史論》一書中，亦在論及俄羅斯的擴張時說：「鬥爭將在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間展開，列好陣勢」(the struggle as arrayed will be between the land power and the sea power)(Mahan 1900: 62)，然後論述日、英、美等「海權國家」結盟以對抗「陸權國家」俄羅斯的戰略思想。此一看法接近蘇峰的想法。事實上，蘇峰看過該書，當有受到啟發（澤田次郎 2011：258）。但後來，日本雖在1902年成功與英國結盟，與美國則在移民問題與太平洋之制海權的問題上開始對立。為此，蘇峰漸從日美同盟論者、脫亞論者轉向亞洲主義者。在此過程中，吾人可看到蘇峰對馬漢之擴張思想的吸收與對其美國擴張主義、種族主義思想的抵抗。

但德富蘇峰與當時在心情上、戰略上從人種、文化視角來提倡興亞的亞洲主義者（如前述的近衛篤磨）不同，是一個對歐洲人在「亞細亞」的概念框架中討論中國與日本之問題感到反感的脫亞論者（米原謙 2002：181）。只是到1913年美國制訂排日土地法，排日運動愈趨白熱化後，在1916年出版的《大正政局史論》，他第一次正式說「東洋門羅主義」（德富蘇峰 1916：400）。然後，在《大正の青年と帝國の前途》（大正青年與帝國前途）中，則說：「亞細亞門羅主義是指由亞洲人來處理亞洲之主義」，主張由日本人為「東洋人種的總代表」，「蕩掃白閩的跋扈」（德富蘇峰 1978：230-232）。然而，不管其表面的言論是「脫亞」或「興亞」的，其背後不變的是，

成爲西洋的「脫亞」志向。爲此目的，他必須挑戰西洋，成爲擁太平洋霸權的「海權國家」，其所假想的敵國就是美國⁴²。

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與美國皆因戰爭而得利，彼此開始競爭太平洋霸權，展開軍備競賽，以致在1922年舉行華盛頓會議，以5：5：3，即英國與美國皆5日本3的噸位比例達成妥協，日本獲得西太平洋的支配權，進入短暫的國際和平時代⁴³。但在此和平時代中，在日本海軍內部，欲與美國對決的思想亦是不斷在發酵的（麻田貞雄 1993：160-189）。最終，在「陸權國家」欲望的驅使下，日本陸軍侵略了滿洲，破壞了以不單獨侵略中國爲前提的華盛頓體制，而導致日本與美國的開戰，及美國完全支配太平洋乃至世界海洋的結果（高坂正堯 1970：149）⁴⁴。

再從另一角度思考，日本所欲確立的是亞太區域的海權，這與放眼世界欲掌控世界之海權的美國海軍思維不同，故「脫亞」的「海權國家」日本與美國之間是有合作空間的，如前述，這樣的想法亦存在日本海軍思想中。但除「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欲望外，「脫亞」思想中有一個跨不過的障礙，那就是人種問題（植村邦彥 2006：180-186）。反過來，這亦成爲亞洲主義之最好藉口。尤其在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排日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後，似乎日本更不得不選擇以亞洲的先進者之姿，去完成其世界史的使命。最後，雖然在「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欲望及世界史使命感之驅使下，日本短暫地建立了大東亞共榮圈，亦促使了許多東南亞國家脫離西方「海權國家」之殖民地狀態（白石隆 2000：190），但最終讓日軍深陷於大陸，深葬於海洋中，將日本帶往幾近破滅之路。

4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賣出百萬本，可見其言論在當時之日本有一定的影響力（坂本多加雄 1996：292）。

43 在東亞地區，這一時期的平和，除了日美等國間的妥協外，中國內部的群雄割據狀態亦給了日本許多操作的空間（坂野潤治 1977：157-161）。

44 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原因複雜，除外本文亦有論及的天皇中心世界觀及「海權」、「陸權」等地政學思想的刺激外，亦存在明治憲法的問題，及日本內部的政商勾結問題、世界經濟的問題等（Gordon 2003：186-196）。

五、結論

首先，自覺到日本的「海國」形勢以區別中國的是，活躍於18世紀後期林子平的《海國兵談》。從此為一個起點，日本開始以「海國」之姿學習西洋、防衛西洋，建構了許多海防論。然後，在19世紀前期，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除防衛之需要外，亦基於社會經濟需要而主張海外擴張論。就其主張的擴張範圍主要是在亞洲地區而言，可謂是明治時期亞洲論述源流之一。

到了明治時期，「海國」的想像與建設讓想將國家打造成亞洲之「新英國」的日本在有形文明意義上達成「脫亞」，進入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中，得與西方國家在亞洲地區爭奪區域霸權。這使得近代日本之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展開於「脫亞」意識之上。再者，來自美國的「海權」觀念提供日本海運與海軍之擴張主義論述的理論依據，合理化其向海洋、周邊的亞洲太平洋地域擴張的軍事行動，最後更導致與美國的衝突，亞洲門羅主義的興起。

雖然，如佐藤鐵太郎的理論般，「海國」的想像與海軍的擴張不必然導向對亞洲的侵略與殖民，而可能導向「海國」同盟論等方向。但此一「海國」的認同的確讓日本知識人找到一個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農業的、封建的中國想像）的差異點，及從「海國」（經濟大國、文明國家）的觀點等強化了自國的優越感。只是日本不同於英美等世界霸權型的「海權國家」，而是一區域霸權型的「海權國家」，主要將其欲稱霸的領域設定在亞洲太平洋。再者，日本甚至以「海權國家」的優越姿態進一步欲成為與俄國一樣的「陸權國家」。只是日本與立基於歐亞大陸的「陸權國家」俄羅斯等不同，是立基於「島國」的地理基礎上。雖然神宮皇后與豐臣秀吉等神話歷史人物的大陸夢想與記憶不斷刺激著日本帝國之「陸權國家」欲望，但似乎從一開始其「陸權國家」欲望就注定會成為另一次歷史妄想。其自以為獨特的「島國」心態何以能長久對抗中國的國族主義及其多元複雜的社會

情況與地緣政治狀況，進而統治之⁴⁵？

不管如何，二戰前的日本已成爲如美英等西洋國家一樣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在人種、文化的方面，特別是在人種問題上，日本無法同化於西洋，而遭到否定與歧視。這一情況強化日本當成爲東洋之盟主的使命感，而該使命感反過來合理化日本稱霸太平洋的「海權國家」欲望與占領中國大陸的「陸權國家」欲望，支持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一種興亞論述）。

「脫亞」與「興亞」看似矛盾的兩個命題，在近代日本知識人的思想中常是無矛盾地共存著。這是因爲「亞洲」是歐洲人所命名的概念，受到西方知識中的亞洲觀制約。對一部分的近代日本知識人而言，儘管亞洲各國的社會與文化有許多差異，但只要在近代西方知識架構中思考，在近代西方國家體系中活動，也只有成爲主權國家，乃至亞洲區域的霸權者，才能向歐洲人證明日本已脫離文明史觀中亞洲段階。就此意義，「興亞」經常只是手段、口號，「脫亞」乃至超克「近代」（「歐洲」）才是目的。

總之，在日本周邊的海洋、特別是太平洋亦成爲歐洲人之世界史的海洋之後，「海國」想像可將日本導向「脫亞」的「海國」同盟論，亦可將之導向以「脫亞」意識爲前提的「興亞」論述中。二戰前的日本，結果是從前者（英日同盟）走向後者（大東亞經濟圈）。二戰後，日本雖不再從事於軍事擴張，不再妄想成爲「陸國」乃至「陸權國家」，但「海國」的認同與想像依舊存在，又將日本引導到「脫亞」的「海國」同盟論的一邊。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高坂正堯在冷戰時期，認爲日本在美國完全支配世界之海洋的時代中，因選擇徹底「脫亞」，在美國的保護下，成爲「極西」之國而獲得經濟的成功（高坂正堯 1970：149-156）。但他亦同時指出在中國擁有核武之後，日本必須回到其非東洋亦非西洋的身分，尋求獨自的力量，以擺脫從屬於美國或中國的困境(ibid.: 156-160)。爲此，他主張日本當擁有最低限度

45 橋樑即是從此角度來理解現實的中國，看待日本的大陸擴張政策的（野村浩一 1999：200-287）。

的武力以減少敵人侵略的企圖，並維持與美國某種程度的軍事同盟關係，然後放棄「島國」思維，面向海洋，以開放的「海洋國家」自許，積極去開發海洋、運用海洋，展現開放、冒險的精神(ibid.: 177-186)。

然而，高坂之改革構想依然是在江戶以來「封閉的『島國』對開放的『海國』」這種思維模式中。雖他的「海國」想像不再是要日本成為東洋盟主乃至世界救世主，而是在維持美日同盟的前提下，企圖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脫離島國化的狀況。只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本的「海國」想像不可避免地轉化為強加「陸國」形象給中國，以強化美日同盟或發展「海洋亞洲」論等的話語（許介麟 2007）。這似乎是對日本過往欲爭奪亞洲陸權之狂妄行為的反省，但又是對其向大陸擴張所造成之歷史問題與責任的逃避。無論如何，走出「島國」心態，放棄「陸權國家」欲望，成為開放的「海國」當是多數現代日本人企求的日本形象。

然如本文開頭所述，從內陸出發打下天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亦開始面向海洋，想像「海國」中國之姿。這對中國共產黨本身是好事壞尚未可知。可知的是，中國的此一轉變將使東亞的海域成為「海國」間的鬥爭之場。當代東亞的現勢似乎是，日本不能再只主張自己是一個平和「海國」，而一味要求中國安於「陸國」身分；中國亦不能無視日本捍衛「海國」形象的決心，而要求其安於「島國」之中。包括台灣在內，東亞地域中的各個大小「海國」如何在競爭中，找出一條彼此可共同發展的道路？這當是現代東亞世界中的一大難題，需各國執政者高度的平衡感覺。再換個角度思考，這似乎也可說是東亞國家在歷經對西洋文明的挑戰、模倣，以及熱戰、冷戰後，共同「脫亞」，進入近代西方主導的主權國家體系的結果。現在的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問題發生的原因之一是伴隨著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大國間海權意識衝撞的結果。其徹底解決方法也只有訴諸於武力或國際法庭，乃至成立所謂共同海洋保護區等類似作法。但前者是吾人所不樂見的，後者實現的可能性亦低。畢竟被主權、疆界、海權等概念所催眠的現代政治家乃至一般人民沒有人願意低頭示弱。平和的維持似乎只能仰賴一方之絕對武力優勢與另一方之忍讓，但此一情勢正在改變中。

然而，近代西洋文明不只帶給了東亞國家主權、疆界、海權、陸權等概念所構築的國際政治體系，亦帶來了普遍的民主主義，及日本之和平憲法這一理想主義下的實際產物。和平憲法雖是美國占領時期的意外結果，然其理念要素不僅存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西方思想家的政治哲學中，亦早已存在於東亞的漢文血脈中。例如：儒學中三代之治的理想，及在美國建國理念中發現三代理想實現的橫井小楠(1809-1869)政治思想（「公共和平之政」），或遠紹孟子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譯者中江兆民(1847-1901)之政治思想等即是⁴⁶。筆者以爲避免東亞海域成爲「海國」間對撞之場的可能方向之一是，在現實國際政治的層次，試圖加強經濟的連帶及尋求共同開發或維持海洋資源的可能性。又在理念的層次，從維持、宣揚、尊重、推廣和平憲法理念開始做起。特別是在筆者的認知中，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東京都與日本政府的購買釣魚島行動中，其背後有一股欲推動修憲的力量，意圖製造修憲氛圍。從此觀點言之，日本內部的維持和平憲法團體與人民之意志必須更堅定，日本以外的國家更需要認知到和平憲法之價值而欲維持乃至適用之。雖然這亦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但亦是紮根於東西哲學普遍理念的一條路，更是在崎嶇的人類文明道路上，理應嚮往的目標。

在這樣的國際政治現況中，衆所周知，小國台灣是舊中華帝國與舊日本帝國的雙重邊境，並位於新興中國勢力與美日同盟的交界處，其位置十分關鍵且危險。正因如此，台灣除當主張對釣魚台列嶼等的主權以凸顯其爭議性外，更需宣揚、尊重、推廣和平憲法理念，以期成爲亞洲和平理念的領航者。

46 這是另一論點的展開，在此已無多餘篇幅討論。相關研究可參見山室信一(2007: 89-128)。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周益鋒。2006。〈「海權論」東漸及其影響〉，《史學月刊》第四期，頁38-44。
- 野村浩一。1999。《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跡》。張學鋒譯。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社。
- 藍弘岳。2011。〈「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二十二卷三期，頁71-112。

二、日文書目

- Mahan, Alfred Thayer (エー・テー・マハン，馬漢)，水交社譯。1896。《海上權力史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東京：東邦協會。
- Schmitt, Carl (カール・シュミット)，生松敬三等譯。1971。《陸と海と：世界史の一考察》。東京：福村出版社。
- 上田信。2005。《中國の歴史9 海と帝國 明清時代》。東京：講談社。
- 丸山真男。2009。〈福沢諭吉の『脱亞論』とその周辺〉，收錄於《丸山真男話文集4》。東京：みすず書房。
- 大内暢三。1934。〈近衛霞山公と東亞同文會〉，《支那》第二十卷第二、三號。
- 子安宣邦。1977。〈佐藤信淵と國學的宇宙形成論〉，收錄於《日本思想大系月報59》，頁1-10。東京：岩波書店。
- 山田吉彦。2005。《日本の國境》。東京：新潮社。
- 山室信一。2001。《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
- 。2007。《憲法9條の思想水脈》。東京：朝日新聞出版社。
- 山縣有朋。1966。《山縣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

- 戸澤行夫。1972。〈開物思想の啓蒙性——「家學」を中心に〉，《哲學》第五十九集，頁77-104。
- 犬塚孝明。1987。《明治維新對外關係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加藤寛治大將傳記編纂會。1941。《加藤寛治大將傳》。東京：加藤寛治大將傳記編纂會。
- 北岡伸一。1978。《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平石直昭。1998。〈近代日本の國際秩序觀と「アジア主義」〉（近代日本國際秩序觀與「亞洲主義」），收錄於《20世紀システム1 構想と形成》（20世紀體系1 構想と形成），頁176-21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本多利明。1970a。《經世秘策》，收錄於《日本思想史大系44 本多利明 海保青陵》，塚本晃弘、藏並省治主編，頁12-86。東京：岩波書店。
- 。1970b。《西域物語》，收錄於《日本思想史大系44 本多利明 海保青陵》，塚本晃弘、藏並省治主編，頁88-163。東京：岩波書店。
- 生田美智子。2008。《外交儀禮から見た幕末日露文化交流史——描かれた相互イメージ・表象》（從外交儀禮來看幕末日露文化交流史——被描繪的相互形象・表象）。京都：密涅瓦書房。
- 白石隆。2000。《海の帝國：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海之帝國：如何思考亞洲）。東京：中公新書。
- 矢野暢。1979。《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公新書。
- 石川泰志。1995。《海軍國防思想史》。東京：原書房。
- 石井研堂。1896《海國偉人傳》。東京：少年園。
- 伊藤銀月。1905《海國日本》。東京：隆文館。
- 古川萬太郎。1991。《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東京書籍。
- 吉田松陰。1986a。《幽囚錄》，收錄於《吉田松陰全集 第一卷》，山口縣教育會編纂，頁579-619。東京：岩波書店。
- 。1986b。《丁巳幽室文稿》，收錄於《吉田松陰全集 第三卷》，山口縣教育會編纂，頁185-259。東京：岩波書店。

- 。1986c。《詩文拾遺》，收錄於《吉田松陰全集 第四卷》，山口縣教育會編纂，頁517-560。東京：岩波書店。
- 。1986d。《戊午幽室文稿》，收錄於《吉田松陰全集 第四卷》，山口縣教育會編纂，頁1-170。東京：岩波書店。
- 吉野誠。2002。《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郷隆盛》。東京都：明石書店。
- 安岡昭男。1998。《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會。
- 朴羊信。2008。《陸羯南——政治認識と對外論》。東京：岩波書店。
- 江見水蔭。1901《海國男兒》。大阪：青木嵩山堂。
- 池田清。1981。《海軍と日本》。東京：中公新書。
- 竹内好。1966。《竹内好評論集 第三卷》。東京：筑摩書房。
- 米谷匡史。2006。《アジア/日本》（亞洲/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 米原謙。2002。《近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近代日本の身分認同）。京都：密涅瓦書房。
- 。2003。《徳富蘇峰》。東京：中公新書。
- 西尾麟慶。1910《海國男兒》）。東京：春陽堂。
- 西岡幹雄。2000。〈本多利明の「自然治道」論と開發經濟モデル——政策思想における「西域」型經世學への轉換〉（本多利明之「自然治道」論與開發經濟模式——政策思想中之「西域」型經世學的轉換），《經濟學論叢》第五十一卷第三號，頁73-140。
- 佐藤信淵。1926。《經濟要錄》，收錄於《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上卷》，瀧本誠一主編，頁665-935。東京：岩波書店。
- 。1927a。〈防海策〉，收錄於《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下卷》，瀧本誠一主編，頁819-829。東京：岩波書店。
- 。1927b。《西洋列國史略》，收錄於《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下卷》，瀧本誠一主編，頁761-818。東京：岩波書店。
- 。1927c。《存華挫狄論》，收錄於《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下卷》，瀧本誠一主編，頁863-939。東京：岩波書店。

- 。1977a。《混同秘策》，收錄於《日本思想大系 59》，尾崎正英、島崎隆夫主編，頁422-485。東京：岩波書店。
- 。1977b。《垂統秘錄》，收錄於《日本思想大系 59》，尾崎正英、島崎隆夫主編，頁488-517。東京：岩波書店。
- 佐藤鐵太郎。1910。《帝國國防史論》，頁86-89。東京：東京印刷。
- 。1912。《帝國國防史論抄》，頁78-82、505-513、525-555。東京：東京印刷。
- 李元植。1997。《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閣。
- 村中朋之。2005。〈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國防戰略轉換の背景——朝鮮を「利益線」とするに至るまで〉（明治期日本の國防戰略轉換背景——論至以朝鮮為「利益線」為止），《日本大學大學院總合社會情報研究科紀要》第5號，頁100-111。
- 足立栗園。1905《海國史談》。東京：中外商業新報商況社。
- 東邦協會。1891a。〈東邦協會設置趣旨〉，《東邦協會報告》第一號，頁1-4、234。東京：東邦協會。
- 。1891b。〈東邦協會講談心得〉，《東邦協會報告》第十二號，頁111。東京：東邦協會。
- 。1891c。〈東邦協會報告發兌の理由〉，《東邦協會報告》第一號，頁10。東京：東邦協會。
- 。1891d。〈東邦協會規約〉，《東邦協會報告》第十四號，頁139，第二條。東京：東邦協會。
- 。1891e。〈海軍〉，《東邦協會報告》第五號，頁1。東京：東邦協會。
- 林子平。1979(1791)。《海國兵談》，收錄於《林子平全集 第一卷》，山岸德平、佐野正巳主編，頁79-88。東京：第一書房。
- 。1980。《三國通覽圖說》，收錄於《林子平全集 第二卷》，山岸德平、佐野正巳主編，頁17-80。東京：第一書房。
- 松本三之介。2011。《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徳川期儒學から東亞協同體論まで》（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從徳川期儒學到東亞協同體論）。東京：以文社。
- 松浦正孝。2010。《「大東亞戰爭」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

の政治經濟史》（為何發生「大東亞戰爭」：汎亞洲主義之政治經濟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松澤弘陽。1993。《近代日本の形成と西洋經驗》。東京：岩波書店。

芝原拓自。1988。〈對外觀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對外觀與國族主義），收錄於《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對外觀》，頁458-534。東京：岩波書店。

初瀬龍平。1984。〈「脱亞論」再考〉，收錄於《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平野健太郎主編，頁19-44。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近衛篤磨。1895。〈「海國」の勃興に關する要務〉（關於「海國」勃興之要務），《精神》第四十七號，1895年1月。

——。1898。〈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之必要〉，《太陽》第四卷第一號，1898年1月，頁1-3。

——。1968。《近衛日記 第二卷》。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

前田勉。2009。《江戸後期の思想空間》。東京：ぺりかん社（鶉鴉社）。

狹間直樹。2001。〈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1)序章アジア主義とはなにか〉（對於初期亞洲主義的歷史考察：(1)序章何謂亞洲主義），《東亞》第四一〇期，頁68-77。

桐原建真。2009。《吉田松陰の思想と行動——幕末日本における自我認識の轉回》（吉田松陰的思想與行動——幕末日本中之自我認識的迴轉）。仙台市：東北大學出版會。

真壁仁。2007。《德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昌平坂學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變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高坂正堯。1970。《海洋國家の構想 增補版》。東京：中央公論社。

荻生徂徠。1987。《政談》。東京：岩波文庫。

陸羯南。1894。〈我帝國の對韓政策を妨害する國は是れ文明國に非ず〉（妨礙我帝國對韓政策之國非是文明國），《日本》1894年7月29日，收錄於《陸羯南全集 第四卷》，西田長壽主編，頁563-564。東京：みすず書房。

——。1899。〈歐米の野蠻思想〉，《日本》1899年2月12日，收錄於《陸羯南全集 第六卷》，西田長壽主編，頁219-220。東京：み

すず書房。

——。1902。〈「島國」と「海國」〉，《日本》1902年4月1日，收錄於《陸羯南全集 第七卷》，西田長壽主編，頁409-410。東京：みすず書房。

麻田貞雄。1993。《兩大戦間の日米關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2010。〈歴史に及ぼしたマハンの影響〉（馬漢對歷史的影響），收錄於《マハン海上權力論集》（馬漢海上權力論集），麻田貞雄主編，頁11-63。東京：岩波文庫。

植村邦彦。2006。《アジアは〈アジア的〉か》（亞洲是〈亞洲式的〉嗎？）。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社（中西屋出版社）。

渡邊利夫。2008。〈海洋國家同盟再論〉，《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環太平洋經濟情報）第八冊二十八號，頁7-12。

塚本晃弘。1970。〈本多利明〉，收錄於《日本思想史大系44 本多利明 海保青陵》，塚本晃弘、藏並省治主編，頁443-473。東京：岩波書店。

碓井隆次。1971。〈佐藤信淵と河上肇——帝國主義思想と社會主義思想〉，《社會問題研究》二十一卷第一、二期，頁1-20。

福本日南。1886。《樊噲夢物語：一名新平民回天談》。東京：澤屋。

——。1892。《海國政談》。東京：日本新聞社。

——。1900。〈東觀小錄〉，《日本人》第3次第108號，1900年2月5日。

——。1903。〈人道とは何ぞや〉，《日本人》，第3次第188號，1903年6月5日。

福澤諭吉。1959a。《文明論の概略》，收錄於《福澤諭吉全集 第四卷》，慶應義塾編。東京：岩波書店。

——。1959b(1881)。《時事小言》，收錄於《福澤諭吉全集 第五卷》，慶應義塾編，頁110-231。東京：岩波書店。

——。1959c。《兵論》，收錄於《福澤諭吉全集 第五卷》，慶應義塾編，頁295-348。東京：岩波書店。

——。1959d。《實業論》，收錄於《福澤諭吉全集 第六卷》，慶應義

塾編，頁145-194。東京：岩波書店。

——。1960a。〈東洋の政略果して如何せん〉，收錄於《福澤諭吉全集第七卷》，慶應義塾編，頁145。東京：岩波書店。

——。1960b(1885)。〈脱亞論〉，收錄於《福澤諭吉全集 第十卷》，慶應義塾編，頁238-240。東京：岩波書店。

廣瀬玲子。2004。《國粹主義者の國際認識と國家構想：福本日南を中心として》（國粹主義者の國際認識與國家構想：以福本日南為中心）。東京：芙蓉書房。

德富蘇峰。1916。《大正政局史論》。東京：民友社。

——。1935。《蘇峰自傳》。東京：中央公論社。

——。1978。《大正の青年と帝國の前途》，收錄於《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八 德富蘇峰》。東京：筑摩書房。

藤川三溪。1886。《海國急務》。神戸：神港堂。

澤田次郎。2011。《德富蘇峰とアメリカ力》（德富蘇峰與美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藤田省三。2003。《精神史的考察》。東京：平凡社。

坂本多加雄。1996。《近代日本精神史論》。東京：講談社。

坂野潤治。1977。《明治・思想の實像》。東京：創文社。

曾良鉉三郎。1892。《海國》。東京：曾良鉉三郎。

纈顯厚。1994。〈大陸侵略思想の構造と系譜〉，《情況 第二期》第五卷第十一期，頁21-37。

三、英文書目

Connery, Christopher L. 2001. "Ideologies of Land and Sea: Alfred Thayer Mahan, Carl Schmitt, and the Shaping of Global Myth Elements," in *boundary 2*, 28(2): 173-201.

——. 1900.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Gordon, Andrew. 2003.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2001a.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Sibree. Kitchener, Ont.: Batoche.

——. 2001b.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S.W. Dyde. Kitchener, Ont.: Batoche.

Mahan, Alfred Thayer. 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McVadon, Eric A. 2009. "China's Navy Today: Looking toward Blue Water," in *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ndrew S. Erickson and Lyle J. Goldstein and Carnes Lord, pp. 375-400.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Saaler, Sevn. 2002. "Pan-asianism in Meiji and Tasho Japan: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DJI Working Paper 02/4*.

四、網路資料

Schmitt, Carl. 2011. *Land and Sea*, translated by Simona Draghici. <http://www.counter-currents.com/2011/03/carl-schmitts-land-sea-part-1/>. (Accessed on 2011/04/20)

許介鱗。2007。〈日本的「海洋立國」夢想——Japan's dream of "the ocean nation"〉，「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http://blog.nownews.com/article.php?bid=4179&tid=95506&tyid=B>。（2011/09/12 瀏覽）